

好客及其限度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好客之舉從一開始就存在經濟上的限制。行會擔心來自新來者的競爭，因為後者帶來了商業經驗以及與倫巴第市場的聯繫。因此，議會將流亡者的活動限制在不會與既有手工業直接競爭的行業範圍內。議會鼓勵發展對該城而言屬於新興的行業，例如絲綢加工、天鵝絨生產以及義大利商品貿易，這些行業為蘇黎世的市民及其鄉村屬民創造了就業機會，同時又不會擠壓現有的工匠。¹這種將難民引導至新興行業的政策，貫穿了近代早期歐洲宗教移民的整個歷史。這也是後來蘇黎世、伯爾尼、日內瓦和勃蘭登堡接納胡格諾派教徒時所遵循的經濟邏輯，下文的比較部分將對此加以探討。

這項經濟政策同時也是一項公共秩序政策。議會力圖防止難民形成一個擁有自身規則的封閉商業僑居群體。義大利商人必須像其他居民一樣記帳、繳納關稅並服從城市法院的管轄。當洛迦諾人後來尋求擔任政治公職時，議會要求他們必須加入某個行會，從而將他們納入市民體系之中。數位洛迦諾商人加入了「Zunft zur Saffran」，即商人、店主以及香料和紡織品經銷商的行會。絲綢企業家埃瓦傑利斯塔·扎尼諾（Evangelista Zanino）自1567年起成為市民，並於十六世紀即為該行會成員；丹尼爾·奧雷利（Daniel Orelli）則自1709年起代表該行會出席大議會。²

重點。蘇黎世以受保護居民的身份接納了 1555 年的洛迦諾流亡者。庇護權立即授予，而市民權則僅逐一授予，且需經過一段時間後才授予。由於 1336 年的行會憲制限制了新來者可從事的行業，議會便引導難民從事對該城而言尚屬新興的行業，首先是絲綢加工以及與倫巴第的貿易。這種庇護權與市民權之間的區分，在一個多世紀裡始終是洛迦諾家族的法律框架。

1 義大利語會眾

流亡者最顯著的特權是擁有自己的教會。蘇黎世議會允許洛迦諾人用義大利語舉行改教派禮拜，該社群邀請了來自錫耶納的伯納迪諾·奧奇諾擔任牧師。奧奇諾曾任加布遣會總代理，於 1542 年 8 月逃離義大利，此後應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默之邀在英格蘭生活，直至 1553 年天主教復辟。1555 年年中，由萊利奧·索齊尼率領的代表團（據某些記載，其中包括法學家馬蒂諾·穆拉爾托）前往巴塞爾，聘請奧奇諾擔任蘇黎世義大利語教會的牧師。³奧奇諾自 1555 年起向洛迦諾人傳道，並用義大利語出版講道集與論戰著作，使這群會眾獲得了遠超其微小規模的思想地位。他的任命亦將洛迦諾人與瑞士更廣泛的義大利宗教流亡者網絡聯繫起來，該網絡包括巴塞爾的塞利奧·塞孔多·庫里奧內、1556 年來到蘇黎世接替康拉德·佩利坎在該城學院任教的彼得羅·馬蒂雷·韋爾米利，以及錫耶納的索齊尼家族。⁴

1563 年，與奧基諾的關係已成為一種負擔。這一年，他的《*Dialogi XXX*》在巴塞爾出版。他的反對者將其中一些對話解讀為對一夫多妻制的辯護，以及對三位一體教義的懷疑。蘇黎世議會在未給予他自辯機會的情況下將其驅逐。奧奇諾於 1563 年底離開該城，隨後又被逐出巴塞爾，在紐倫堡度過了冬天。1564 年春天，他帶著年幼的孩子遷往克拉科夫。同年夏天，國王西格蒙特二世·奧古斯特在教廷大使的敦促下，驅逐了所有非天主教的外國人，他因而再次遭到驅逐，並於 1564 年底或 1565 年初在摩拉維亞的奧斯特

利茨（斯拉夫科夫）默默無聞地去世。⁵對洛迦諾人而言，這起事件表明，即使在改革宗政府的保護之下，一個外國教會群體的地位依然極為脆弱。他們的正統性受到監視，任何涉嫌反對三位一體思想的跡象都可能被用來對付他們。

2 註釋

1. Paul Keller，〈胡格諾派對蘇黎世市工業的影響〉（Der Einfluss der Hugenotten auf die Industrie der Stadt Zürich），〈瑞士統計與國民經濟雜誌〉（Zeitschrift für schweizerische Statistik und Volkswirtschaft）（1925 年），<https://www.sses.swiss/journal/archive/pdf/1925/1925-I-26.pdf>（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閱）。Keller 描述了該城嚴格的壟斷政策，即禁止鄉村作坊並將絲綢製造保留給城市，並將洛迦諾人視為在中世紀絲綢業消失之後重新引入絲綢加工的群體。
2. 維基百科，「丹尼爾·奧雷利」，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niel_Orelli（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閱）：Daniel 奧雷利自 1709 年起代表薩夫蘭行會出席大議會。馬丁·拉斯納，〈扎尼諾，埃萬傑利斯塔〉，載於《瑞士人名辭典》（DHS），2012 年 5 月 21 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fr/articles/028581/>（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閱）：自 1567 年起為蘇黎世市民，“Membre「藏紅花行會」”，自 1558 年起從事緞子織造，自 1565 年起生產米蘭粗斜紋布。另見漢斯·舒爾特斯（Hans Schulthess），〈洛迦諾與蘇黎世的奧雷利家族〉（Die von Orelli von Locarno und Zürich）（蘇黎世，1941 年）。
3. 維基百科，「Bernardino Ochino」，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ino_Ochino（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閱）：“Lelio 索齊尼與律師馬蒂諾·穆拉爾托受派前往，以確保奧基諾能擔任蘇黎世義大利教會的牧師。」米格爾·戈托爾，「Ochino, Bernardino」，載於《義大利

人傳記辭典》第 79 卷（2013 年），[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bernardino-ochino_\(Dizionario-Biografico\)/](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bernardino-ochino_(Dizionario-Biografico)/)（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閱）：自 1538 年 6 月起任嘉布遣會總代理；1542 年 8 月 22 日致 Vittoria 科隆納在信中宣布其流亡決定；應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默之邀，與韋爾米利一同前往英格蘭；「1553 年天主教復辟後」返回瑞士；「1555 年年中，一支由錫耶納人萊利奧·索齊尼率領的代表團前往巴塞爾與他會面，提議他遷居蘇黎世」。戈托爾未提及馬蒂諾·穆拉爾托。

4. 克里斯·卡斯塔爾多（Chris Castaldo），關於彼得·馬蒂爾·韋爾米利（Peter Martyr Vermigli）的文章，戴文南特研究所（The Davenant Institute），2019 年 8 月 19 日，<https://davenantinstitute.org/vermigli-forgotten-reformer/>（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閱）：1556 年，Vermigli「接受了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的邀請[...]，接替康拉德·佩利坎（Conrad Pellican）在蘇黎世學院的職位」。阿爾巴諾·比昂迪（Albano Biondi），〈庫里奧內，塞利奧·塞孔多〉，載於《義大利人傳記辭典》第 31 卷（1985 年），[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celio-secondo-curione_\(Dizionario-Biografico\)/](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celio-secondo-curione_(Dizionario-Biografico)/)（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閱）：1547 年定居巴塞爾並擔任該大學修辭學教席，任職二十三年直至去世。關於錫耶納人 Lelio 索齊尼，參見戈托爾，「奧奇諾」（見上文）。另見德利奧·坎蒂莫里，《十六世紀的義大利異端分子》（佛羅倫斯 1939；新版都靈 1992）。B.I 章更詳細地論述了義大利宗教改革網絡。

5. 維基百科，「Bernardino Ochino」（見上文）：1563 年出版《Dialogi XXX》，遭驅逐「無機會為自己辯護」。戈托爾，「奧奇諾」（見上文）：《Dialogi XXX》未經蘇黎世議會事先許可即付印；避居巴塞爾，亦遭驅逐；「1563 年冬季在紐倫堡度過」；次年春季「帶著年幼的子女」遷往克拉科夫；1564 年夏季，在教廷大使喬瓦尼·弗朗切斯科·科梅多內（Giovanni Francesco Commendone）的壓力下，國王西格蒙德二世驅逐了所有非天主教的外國人；「在 1564 年底至 1565 年初之間某個未確定的日子」於奧斯特利茨逝世。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hospitality-and-its-limits